

战后法国外交史

(1944—1992)

张锡昌 周剑卿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战后法国外交史

(1944—1992)

张锡昌 周剑卿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京)新登字 021 号

责任编辑: 许淑珍

封面设计: 丁 品

战后法国外交史

(1944-1992)

张锡昌 周剑卿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 31 号 邮编: 100005)

中国华云公司照排部排版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20.25 插页: 2 字数: 504000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7-5012-0575-2/D·107 定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的话

从50年代初投身于外交工作起,我们就同法国结下了不解之缘。整个工作历程同战后法国内政、外交的风云变幻息息相关。作为外交官,先后在巴黎度过11个春秋,有幸接触法国各界人士,以至戴高乐、蓬皮杜和密特朗等领导人,得以亲历其境,摸到法国政治生活的脉搏。能有机会把外交工作中的感受和长期从事研究的体会加以总结提高,整理成书,奉献给广大的史学和国际问题爱好者,是我们多年来的心愿。

本书之所以能问世,首先要感谢世界知识出版社的朋友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本书筹划过程中,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研究中心”聘任张锡昌为研究员,提供极其优越的工作条件,使之度过富有成果的一年。哈佛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接受张锡昌为客座研究员,特别是该中心主席、著名的欧洲和法国问题专家斯坦利·霍夫曼教授给予热忱指导。巴黎“戴高乐研究所”在周剑卿从事戴高乐研究的长时间内,给予种种方便。特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我们还要感谢有关领导和同事们在多年工作中的关心和帮助。

本书由周剑卿撰写导言及一至三章,张锡昌撰写四至六章及结束语,并通读全稿。张锡昌曾先后以张帆、季寅等笔名发表过国际问题评论,有的看法和材料已吸收在本书之中。

1993年2月于北京

导 言

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长期以来在国际事务中有着重要作用和影响的国家，由于历史传统、地缘政治、民族利益、人民情绪、经济条件、文化遗产等多种原因，其对外政策往往有某些万变不离其宗的因素。然而，由于国际形势和国内政局的变动以及不同执政者的不同思想、气质、风格、政治色彩等原因，对外政策又必定会有调整和发展变化。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外交，有时连续性占上风，有时调整变化占主导地位。因此，观察一国外交，既不能割断历史、忽视传统，又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法国曾是一个称雄欧洲和影响遍及全球的强国。目前它仍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法国外交的连续性因素，有的可追溯到几个世纪之前，有的可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或第四共和国时期（1946—1958年）。不过，自1958年戴高乐重新执政创建第五共和国以来的30多年中，法国对外政策的连续性更为引人注目。戴高乐派的乔治·蓬皮杜、独立共和党人吉斯卡尔—德斯坦和社会党领袖弗朗索瓦·密特朗三任政治色彩不同的总统，尽管外交风格不同，具体政策、策略、做法有调整有发展，但就他们同戴高乐对外政策的大政方针的关系而言，则是继承多于创新，延续多于调整。其对外政策的实质都是戴高乐主义。这是第五共和国外交的重要特色。

1958年无疑是战后法国历史的一个最明显的分界线，也是法国外交的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这是否意味着第四共和国与第五共和国的对外政策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而毫无连续性可言呢？我们认为不能这么看。

从总体上说，第四共和国对外政策是经济上依赖美国援助、军事上依靠美国保护、政治上仰承美国鼻息的大西洋政策，同第五共和国抗美独立的对外政策当然有着本质的区别。然而，如果把第四共和国的外交归结为一味追随美国，也未免失之简单化。

事实上，第四共和国并不甘心听任美国摆布，不时在大西洋联盟内反对美国的控制，在某个时期、某些问题上公开同美国闹独立性，违抗美国意志，采取某些维护法国独立主权和民族利益的行动。特别是1954年以后，法国对美援的依赖大大减轻，法美在殖民地问题和法国在大西洋联盟内的地位问题等方面的矛盾加剧，法国对美离心倾向增强，法美争斗有时甚至闹到十分尖锐的地步，法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54年7月，法国不顾美国的阻挠和反对，断然结束印度支那殖民战争，签署日内瓦协定，这是第四共和国违抗美国意志的头一个重大独立行动。10月，法国国民议会无视美国的强大压力，否决重新武装西德的“欧洲防务集团”条约。1956年法、英勾结以色列，背着美国，出兵苏伊士运河，这也是法国的独立行动，尽管很不光采。法、英侵埃战争由于美国拆台而惨遭失败，接着美国宣布填补中东“真空”的艾森豪威尔主义，取代法、英在中东的势力。在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中，美国也力图乘人之危排挤法国，取而代之。这就加剧了法美矛盾。法国反美情绪从左翼进步力量扩展到右翼，从政界扩展到军方。法国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日益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应该说，戴高乐奉行抗美独立政策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同第四共和国后期别别扭扭的法美关系不能说毫无联系。

二

维护大国地位，几世纪来一直是法国外交的首要目标。特别是1870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败北以后，保持大国地位更成为法国外交的突出问题。恢复大国地位是战后40多年来法国对外政策的主线，也是第四、第五共和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共同特点。

早在16世纪，法国就同英国、西班牙、奥地利并列为欧洲强国。直至1939年，法国一直处在欧洲和世界大国之列。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了法国的双重特性：它既具有传统的高度中央集权国家威加天下的王朝特性，又具有向世界传播先进政治思想的革命特性。大国地位观念往往同某种道义责任和历史使命感搀杂在一起，甚至包含着某种以“救世主”自居的民族心态。戴高乐对安德烈·马尔罗说过：“在法国的伟大与他国的自由之间有着绵延2000多年的公约。”^①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摇篮，法国素以“人权的祖国”和“自由与民主”的象征自居。法国的语言、文化也是法国人十分自豪的，曾被执政者当作在全世界扩展影响的重要手段。要使法国的文化、法国关于人和社会的独特的声音响彻全世界，保持大国地位，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独特作用，不仅是法国声誉和利益之所系，甚至被法国统治集团视为法国对世界命运肩负的历史使命。总之，法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往往不仅取决于人口、面积、工业、金融和军事实力等“硬国力”，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很难用物质形态表现的数量来衡量的其他“软国力”因素。大国地位观念深深扎根于法国历史传统和法国人民的心目之中。二次大战期间，法国一败涂地，国土沦丧。战后时期，洗刷战败耻辱、恢复大国地位，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

^① 马尔罗著：《砍倒的橡树》，巴黎加利马出版社，1971年版，第88页。马尔罗系法国当代著名作家，戴高乐的密友，1958年6月至1969年6月先后任文化部长、负责文化事务的国务部长。

在法国的地位问题上，第四共和国陷于这样的矛盾状态：一方面，作为长期以来欧洲以至全球大国，法国不甘心屈居二流国家地位；另一方面，当时法国外交有着两个致命弱点：国内政治危机迭起，削弱了对外行动能力；连年殖民战争侵蚀其经济、军事实力和国际声誉，实现恢复大国地位的战略目标力不从心。然而，第四共和国没有屏弃历史传统，明知不再是一流国家，却继续顽强地表现出要被承认为世界性大国的意愿，不放弃恢复大国地位的努力。它那些与大国地位相联系的重要政策目标，同第五共和国有不少类似之处。主要表现在：（一）在大西洋联盟内争取与美英平起平坐的地位，从乔治·皮杜尔、雷纳·普利文到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等几任总理，一再要求建立美、英、法三国领导体制。（二）自力更生发展核武器，挤进大国核俱乐部。（三）建立以法德和解与合作为基础、以法国为盟主的西欧联合体，作为重振大国地位的支柱。（四）保持高于西德的地位，捆住西德手脚，以确保法国在西欧的主导地位。

戴高乐的对外政策在这些方面对第四共和国也有不同程度的继承和联系。

就法国同北约的关系而论，1958年戴高乐要求改组北约，主张建立美、英、法三国指导机构，从而让法国分享西方世界领导权。这同第四共和国的设想一脉相承。戴高乐1966年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这一惊人之举，乍看起来似乎同第四共和国毫不相干，实际上此举在一定程度是第四共和国后期对美国 and 北约强烈不满的继承和发展。从苏伊士运河战争到阿尔及利亚战争，法国军政当局深感北约并不总是能维护法国的利益，设法逐步减少对北约承担的义务，松弛同北约的关系。当然，当时只是并不显眼的量变，戴高乐则实现了质变。

从第四共和国到第五共和国，企求以军事实力特别是核武器为后盾，争取大国地位的政策也是一贯的。法国第一个原子装置是在戴高乐任内1960年2月13日试爆成功的，但这不能都记在

戴高乐的功劳簿上。研制原子武器的决定早在戴高乐再度出山前就已作出。1954年12月孟戴斯—弗朗斯政府决定加紧原子能军事用途的研究，实际上敞开了发展核武器的抉择。法国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受两个核大国摆布的极不愉快的经历，给法国统治集团极大的刺激，从而加速了研制核武器的步伐。1958年4月11日，费里克斯·加亚尔总理正式签署制造原子弹的法令，并确定1960年第一季度在撒哈拉试爆。负责实施原子武器计划的埃勒雷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确实是第四共和国将我国核军备的火车驶上轨道的，尽管其间有过犹豫不决。”^①

发展核武器的努力反映了法国历届领导人的信念：核武器不仅有着重要的军事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影响；在核时代，核武器是一个国家的国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标志，在一定意义上，谁掌握核武器谁才能挤进世界大国的行列。在世界上分成核国家和非核国家的情况下，法国非成为核国家不可。70年代中期，原先强烈反对建立法国独立核力量的共产党、社会党先后改变立场，发展独立核力量遂成为全国各派政治力量的共同政策。戴高乐之后，历届总统都把进一步发展核力量放在突出地位，作为法国重要的安全保障以及争取大国地位、维护民族独立的重要政治手段。从70年代起，法国建立了由陆基中程导弹、发射导弹的核潜艇、携带核弹的轰炸机和战术核导弹组成的比较完整的独立核力量体系，成为仅次于美、苏的世界第三核大国。

自1950年以来，历届政府奉行西欧联合政策也是一贯的，共同的。在第四共和国不安宁和不稳定的事态中，有一种政策思想却是稳定的，这就是西欧联合的思想。历届政府领导人都认识到建立一个联合的欧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设法推动西欧联合，尽管各自对西欧联合的构想不尽相同。西欧联合的第一个决定性步

^① 夏尔·埃勒雷著：《法国的核奇遇：核打击力量是如何诞生的》，巴黎格拉塞出版社，1968年版，第301页。

骤——“欧洲煤钢联营”，是第四共和国在1950年率先倡导的；《罗马条约》是第四共和国签订的。戴高乐及其继承者则在此基础上不断深化和扩大西欧联合。40多年来，西欧联合一直是法国外交的立足点。这既是振兴法国经济的重要手段，又是恢复大国地位的重要途径。但法国的侧重点不同于有的西欧国家，政治考虑是第一位的，经济考虑是第二位的。对法国来说，经济联合是手段，政治、外交才是目的，而不是相反。这项政策的政治目标就是通过组织以法国为主导的西欧联合，赢得至少不低于英国而高于西德的地位，进而树立法国的世界大国地位。戴高乐曾被指责试图建立“法国的欧洲”，其实，在这一点上，戴高乐的欧洲政策同其他法国领导人的区别只在于他的做法更为露骨罢了，实质是一样的。

法国对西欧联合的政策同对德政策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首先是针对德国问题的。法德在历史上曾长期互相敌对，多次兵戎相见。仅从1870年普法战争算起，70年间，两国三次大规模交战，巴黎两度遭德国占领。法国一直把德国看作其安全的主要威胁和称雄欧洲的劲敌。如何约束强大的东邻德国以维护法国的安全和霸主地位？这是长期以来法国外交的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可以说，法国传统外交一直是围绕德国问题这个中心而展开的。

战后初期，法国政府曾试图回到传统的对德政策，力求通过某种国际安排肢解、削弱德国。但是，随着美苏分别控制欧洲和东西方对抗体制的确立，法德成了同一阵营中的二流成员，再没有理由互相对立；法国防务安全的主要对象从德国转向苏联，德国不再是法国的前沿，而成为法国安全的屏障；德国一分为三（东德、西德、柏林），给法国推行法德和解政策提供了现实的基础。于是，法德从世仇宿敌变为盟国友邦。以1950年提出建立法德煤钢联营的“舒曼计划”为契机，法国开始转而采取以法德和解为基础的西欧联合政策。这是法国对德政策的重大转折。

不过，对德国疑惧的阴影仍然笼罩着法国外交。法国对德政策变中有不变。防范、约束德国这基本的一面始终没有变，只是方式、方法有所不同而已。

历史上，法国主要采取同德国的东、西大国结盟的办法来防范、约束德国。战后，欧洲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旧的力量结构被摧毁，以往一些实力大体相当的国家建立某种均势以防止其中一国称霸欧洲的传统外交已行不通。在两极格局下，均势概念本身也起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所谓均势，最根本的是美苏在全球范围的战略平衡和欧洲地区东西方力量的平衡。防范德国既不再可能因袭传统的均势外交，更不可能在法德双边关系的范围内来解决，于是，法国试图通过西欧一体化结构来拴住西德。

法国对德政策的这一重大转变，在第四共和国时期已初步完成。第五共和国历任总统沿用和发展了这一基本政策。戴高乐将法德全面和解与合作以法德合作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以独立核力量和政治优势平衡西德雄厚的经济实力。蓬皮杜则吸收英国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拉英制德，加强平衡和约束西德的力量。吉斯卡尔—德斯坦同西德总理施密特密切合作，深化西欧联合，并将法德合作推向新的高峰。他主张吸收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参加欧洲共同体以强化欧洲共同体南翼，平衡西德。近年来，密特朗积极倡导将欧共体发展成为奉行共同的对外政策和安全政策的欧洲政治联盟，目的之一就在于把统一后的德国继续牢牢拴住在西欧经济、政治、军事一体化的结构之中。

三

以上侧重说明战后法国对外政策连续性这一面。当然，40多年来法国外交经历了重大变化。最大的变化莫过于从对战后世界新形势、欧洲新格局不适应到逐步适应这一历史性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国际关系方面影响最为深远的后果是彻底摧毁了数百年来形成的欧洲列强争雄的多极体系，“欧洲中心”结

构不复存在，欧洲老殖民帝国无可挽回地解体了。一个由欧洲列强主宰全球的旧时代结束了，代之而起的是美苏争霸世界的两极格局。在欧洲，两极格局的集中表现就是欧洲一分为二和北约、华约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对峙这种美苏分治的局面。

法国作为战前欧洲列强之一而在战争中被严重削弱的国家，作为尚在各大洲拥有大片殖民地的第二号老牌殖民帝国，如何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以适应新的世界形势和新的国际力量结构？这是战后法国外交所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也是最大的难题。

战后最初的10多年中，法国对外政策往往不是根据世界和欧洲形势的新因素、新特点而制定的，更多是因袭传统观念和传统外交，处处被国际事态牵着鼻子走，缺乏驾驭事态的总体政策思想。因此，法国外交长期陷于未能适应变化了的外部世界的严重危机。主要表现在：既不适应超级大国现象，又不适应不可阻挡的民族解放的潮流。而这种对国际重大变化的不适应又转化成无休止的国内争议，与党派矛盾斗争紧紧纠缠在一起，从而不仅使法国在外交上处于被动地位，而且导致国内政局动荡不定。

第四共和国历任总理中，唯有孟戴斯—弗朗斯曾试图大刀阔斧地调整政策以适应战后新的历史条件，但以半途而废告终。1954年他执政的7个月零17天，在一定意义上，算得是第四共和国的一个特殊时期，对外政策经历了引人注目而又十分曲折的变化。他冲破美国 and 国内主战派的阻挠，果断结束印支殖民战争。但他在非殖民化问题上又有着很大局限性。对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处理，他就未能破除传统的陈腐观念：“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更不敢触动阿尔及利亚殖民集团的利益。延续8年之久的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正是在他任内开始的。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敢于同美国闹独立性，但对美国又有其软弱的一面。他敢于违抗美国意志结束印支战争，接着法国却参加了美国策划和控制的东南亚条约组织；他不顾美国的压力埋葬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然而又很快同意让西德直接参加北大西洋公约，以实现美国重新武装西德的计划。

他的对外政策总体上仍未能脱出大西洋政策的窠臼，没有能提出使法国外交适应超级大国现象的一套新的政策主张。

第二次大战前，第三共和国的政策未能适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出现的许多新问题。1918年到1940年成了法国历史上最不祥的年代，导致法国沦亡近5年之久。而第四共和国未能适应战后新形势，触发了不可收拾的政治危机，导致第四共和国本身的覆亡。

戴高乐1958年重新执政后最重大的成就，乃是实现了法国外交对战后世界的适应，制定了在两极格局中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一整套方针政策，使法国外交具有一定的驾驭国际事态的能力，从被动转入主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全国各派政治力量的共识，稳定了法国政局。

四

从战后初期到50年代末，面对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包括戴高乐在内的法国历任领导人都无所适从。正因为法国在二战中惨败，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法国统治集团更把保持殖民帝国的完整性当作恢复大国地位的一张王牌。他们头脑里装的仍然是以版图、面积为重要标志的大国观念，认为一旦丧失殖民帝国，也就无大国地位可言了。他们怎么也跳不出老殖民主义的圈子，逆民族解放的潮流而动，力图以大规模军事镇压维持殖民帝国。虽然在个别问题上曾有过改弦易辙的尝试，但没有形成适应非殖民化潮流的总体思想和明确的前后一贯的政策，致使法国陷于连绵不断的殖民战争而不能自拔。

1954年印度支那殖民战争的惨败给法国统治集团以极大的震动和打击，但还不足以使之改变行之多年的老殖民主义政策，仍然不惜任何代价以武力维护残存的殖民帝国。结果，从1945年到1962年整整17年中，除两次短暂的间歇，法国始终未能摆脱殖民战争的羁绊。第一次间歇持续不到一年零三个月，即从1945年9

月2日日本投降至1946年11月23日法国海军轰击海防揭开印度支那战争的序幕。第二次间歇时间更短，只有三个半月，即从1954年7月21日签署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协议至11月1日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

连年殖民战争消耗了法国大量的经济、军事力量，削弱了法国的国际地位，特别是在欧洲和大西洋联盟内的地位，加剧了国内的政治动荡，反过来又严重妨碍了法国外交对战后世界的适应进程。

与英国相对迅速的非殖民化进程形成对照，法国的非殖民化进程是漫长和充满战争与危机的。这同历史形成的法国殖民统治的特点是分不开的：

（一）英国在殖民地惯用间接统治方式，利用当地的权力结构为大英帝国服务。本世纪初叶就逐渐实施“自治领”制度，30年代初开始建立英联邦，为二次大战后的非殖民化进程提供了某种模式。法国则一向推行同化政策。法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导面一直是中央集权思想，对殖民地同样实施中央集权原则。这表现为对殖民地的直接统治方式，由巴黎委派的殖民官吏主宰一切。任何放松直接统治的行动往往被视为对法兰西帝国的背弃。1944年1月戴高乐主持召开的布拉柴维尔会议，标榜对法国与海外领地的关系进行改革，但会议文件仍然排除了“任何自治的思想，任何在法兰西帝国之外演变的可能性，以及在殖民地建立——即使在遥远的将来——自治政府的可能性”^①。第四共和国宪法将“法兰西帝国”易名为“法兰西联邦”，宣称法国与殖民地在“权利、义务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联邦。实际上并未超越直接统治方式和传统的同化政策。

（二）英国的殖民利益更多是同贸易、投资等经济因素有关，

^① 法国波尔多“非洲研究中心”研讨会纪要：《戴高乐将军与非洲政策》，巴黎佩东出版社1980年版，第65页。

因而在其经济利益可望得到某种程度的保障的前提下，非殖民化政策较易为统治集团的多数所接受。作为高利贷帝国主义的法国，资产阶级的利益集中在信贷、金融和借贷资本方面，因而同殖民地没有像英国那么深厚的商业传统，对殖民地的资本输出也不多。农业庄园主、殖民官吏、殖民军人等构成强大的殖民利益集团，形成对非殖民化的重大阻力。

（三）从内政因素看，英国有着稳定的两党制度和相对有力的政府，在推行非殖民化政策方面具有较强的连贯性。而法国党派林立，时分时合，政府朝不保夕，软弱无力，穷于应付殖民地的眼前事态，难以冲破重重阻力，对非殖民化作出明确果断的抉择，更谈不上制订和实施通盘解决的政策。

戴高乐原是一个竭力维护法兰西殖民帝国的地地道道的帝国派军人，把遍及全球的殖民地看作是法兰西光辉业绩的一部分。他在首次执政期间奉行老殖民主义政策，以维护法兰西帝国的完整性。1946年8月27日他向报界的谈话中强调：“同海外领地联结在一起，法国是个大国；失去这些领地，法国将不再成为大国。”^①只是由于不可抗拒的民族解放的革命浪潮猛烈冲击，他才不得不改弦易辙。他复出后能从全局的战略利益着眼，从政治现实主义出发，使自己的政策逐步顺应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转变为非殖民化的倡导者和坚定不移的实施者。

这一转变自然是很不容易的。他曾多次向他的亲密助手流露过自己出于无奈的痛苦心情。他对戴高乐派元老加斯东·巴列夫斯基说过：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必须勇往直前，“反对敌人，反对朋友，也反对我自己。”^②他在回忆录中也承认，“对于一个像我这样年龄和受过这样教育的人，成为由我自己倡导的这样一项变革事业的主持人，这确实是残酷的。”“对我来说，要在那些地方移

① 《戴高乐将军的非洲政策》，第59页。

② 《希望》杂志，第43期，巴黎戴高乐研究所1983年6月出版，第23页。

交我们的权力，卷起我们的旗帜，合上这部伟大的历史是一种多么痛苦的精神上的考验啊！”^①

他以过人的胆略和政治魄力冲破统治集团内部的重重障碍和顽抗，果断结束旷日持久的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屏弃“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的传统观念，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军事政变也罢，行刺暗杀也罢，都不能使他后退。他进而实现了整个法兰西殖民帝国的非殖民化。到1962年，除吉布提外，法属非洲殖民地全部独立。戴高乐以“合作”政策代替老殖民主义政策，同新独立国家签订一系列“合作”协定，在新形式和新条件下尽可能保全尚能保全的传统势力和利益。实施非殖民化政策的结果是，法国在政治上取得主动地位，大大改善了国际处境，恢复和扩大了法国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增强了全球抗美的地位。与此同时，法国得以将主要力量转向维护民族独立、争取大国地位这个主要战略目标。戴高乐以后的历届总统都沿袭对法属前殖民地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政策。

五

对超级大国现象从不适应到适应，这是法国外交的另一个重大转折。

戴高乐任临时政府首脑期间，并未充分意识到美苏两极格局取代了几世纪来以欧洲为中心的列强争雄的旧体系这种根本性变化，还是用传统观点来看待战后形势和考虑对策的。“德国的命运是世界的中心问题。”^②这就是他对战后形势的最基本的判断。据此，他把防止德国东山再起放在法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首位。他没有认识到，不是德国的命运决定欧洲和世界的命运，而是新的

^① 《希望回忆录》第1卷《复兴》（1958—1962年），巴黎普隆出版社1970年版，第41—42页。

^② 1944年11月22日戴高乐在咨询议会的讲话。

欧洲和世界格局决定德国的命运。德国问题本身已被纳入美苏在欧洲的争夺和对抗的范畴，成为“雅尔塔”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国的分裂不再是作为防止德国再起的手段，而是成了欧洲分裂的体现。此时德国问题已退居次要地位，法国外交面临的主要课题不再是如何防止德国的威胁，而是如何在欧洲分裂、美苏对抗中维护法国的独立和主权。当他逐渐意识到两个超级大国企图主宰欧洲时，他认为处于美苏之间的法国应该“保持严格的平衡”，以扩大外交上的回旋余地和维持其切身利益。而在美苏分治欧洲和冷战升级的情况下，保持平衡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第四共和国在世界两大阵营、欧洲两大集团对立中正式作出全面倒向美国的抉择，损害了法国的独立。法国在外交上的回旋余地缩小了。

倡导和积极推行西欧联合政策可算是第四共和国谋求在两极格局中为重振法国地位另辟蹊径的尝试。西欧一体化总带有某种抗美独立的动机。不过，50年代西欧联合尚处于搭架子阶段，经济上特别是政治上的作用尚未充分显露。抗衡美国的观念还是朦胧的。而且，当时美国是鼓励和支持西欧联合的，力图把正在形成中的西欧联合纳入美国的战略轨道，以期建立一个在美国控制下的统一的西欧，从而巩固美国在欧洲的势力范围，加强同苏联争霸的地位。因此，当时法国推行西欧联合政策同大西洋政策并无多大矛盾。

戴高乐再度上台后，对美国采取既联盟又独立、在联盟中增强独立地位的政策。既从一个超级大国获得不可或缺的军事保护，又在保护者面前保持独立性。对苏联采取“缓和、谅解、合作”的政策，建立法苏特殊关系，借助苏联增强同美国分庭抗礼的资本，从而走活法国外交棋局。与此同时，戴高乐还联德排英，以“欧洲人的欧洲”对抗美国的“大西洋共同体”，加强西欧和法国在美苏间特别是对美国的地位和独立性。

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戴高乐再度执政期间，已不再是两极格局的一统天下，而是国际体制开始从两极格局走向多极化的